1

同学们 欢迎 回来

在上一课我们学习了资本-帝国主义

对近代中国的侵略和中国人民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

中国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逐渐加深

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新问题 新任务是

第一 如何抵御外国侵略 如何救亡图存

第二 如何向西方学习 如何求强求富

中国社会各阶级都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

我们知道随着近代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

在旧的地主阶级 农民阶级之外

又产生了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

不过在1919年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登上历史舞台之前

探索中国国家出路的重任主要是落在了

农民阶级 地主阶级洋务派 资产阶级维新派

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肩上

在这一课我们就先来学习农民阶级

地主阶级洋务派 资产阶级维新派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爆发

最根本的原因是外国的侵略进一步激化了

中国固有的阶级 社会矛盾

如我们在第一周的课中所说

从十八世纪中晚期开始

中国社会本就面临着消费人口增长超过了

农业生产的增长的严重的人口压力

在人均耕地急速下降的同时

土地也在日趋集中化

农民负担的赋税加重 农民无法维持生计

只能卖掉土地成为地主的佃农

鸦片战争之后 这种情况更为普遍且日趋尖锐化了

首先 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付出了巨额的军费

按照《南京条约》的规定

还要向英国支付大量赔款

这就迫使清朝统治者在繁重的

旧捐税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捐税

这些负担最终当然都要落到农民的头上

农民的田赋负担进一步加重

而且 鸦片战争失败后

鸦片贸易进一步泛滥

白银大量外流 银贵钱贱的现象更加严重

原本法定一千钱换一两银子 在鸦片战争后

各地银钱比例上涨到1比2000甚至2300

而农民缴税最终需换算成为银两

因此 与乾隆 道光时期相比

农民常常需要以三年之粮完一年之粮

这种情形 就如马克思 恩格斯所描述的

“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 税金不能入库

国家濒于破产 大批居民赤贫如洗

这些居民开始愤懑 进行反抗 ”

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还有一些具体因素

鸦片战争后 五口通商 商路改变

战争之前 广州是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

进出口货物经两条道路运达广州

或从广州运入内地

一条是广州经大庾岭沿赣江北上至江西九江

一条是自广州经南风岭到湖南湘潭

两条商路之上 从事运输 护商 旅店 商贩等业

及依附为生者不下百万

商业中心移至上海后 广东 湖南

江西百万人失业

再加以1846-1851年间水旱蝗灾频发

西南及长江流域等数千万人受灾

饥民遍地 饿殍载道

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民众

纷纷聚集在白莲教 天地会 捻党等

旗帜下 揭竿而起

据统计 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

全国各地共发生民众起义百余次

而具体到太平军首义的广西地区

情况就更为独特

除了上述诸多现象与其他地方大同小异之外

广西又有其独特之处 众多的小矿 特别是银矿关张

使大量矿工和手工艺人失业 成为流民

而当时中国还不存在大规模的工业

来吸纳这些过剩的劳动力

这些流民不能进入生产性的管道

而极容易成为社会暴动 革命的主力军

1843年 多次科举考试落地的秀才洪秀全

创立了“拜上帝教” 洪秀全本人熟读四书五经

他清醒地意识到 孔子及儒教是士大夫们的宗教

三纲五常是统治阶级用来控制人民的工具

而非常不适合用来作造反的工具

与传统的“反清复明”的天地会 白莲教不同

洪秀全更想创立一个新世界

而原始基督教教义之中

既有着法力无边 奖惩分明的绝对权威

也有着下层民众要求的平等思想

洪秀全就将其改造为“拜上帝教”

吸引了大量的广西客家人

手工业者 矿工加入 发展迅猛

1851年1月 洪秀全率拜上帝教教众

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

建号太平天国 随后 起义军

从广西经湖南 湖北 江西 安徽

一直打到江苏 席卷6省

1853年3月 占领南京定为首都 改名天京

正式宣告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建立

太平军所进行的战争

是一次反对清政府腐朽统治和

地主阶级压迫 剥削的正义战争

太平军在进军的征途中 坚决镇压和打击

官僚 豪绅 地主

焚烧衙门 粮册 田契 债券

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统治秩序

太平军纪律严明 所过之处

“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 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

这使太平军受到群众的热烈的欢迎和拥护

因此 太平天国起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

先后进行了北伐 西征和天京城外的破围战

到1856年上半年 除北伐失利外

太平军在湖北 江西 安徽和天京附近的战场

都取得了重大胜利

控制了大片的地区 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1853年建都天京之后

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

确立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

根据“凡天下田 天下人同耕”的原则

将土地按照产量好坏搭配 再进行均分

16岁以上的男女均可分得一份数量相同的土地

因此《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

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社会改造方案

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

与特色的纲领性的文件

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

是对以往农民战争中

“均贫富”“均田”思想的发展和超越

虽然限于当时的条件限制不能立即实现

但从心理上满足了群众对于平均土地的强烈要求

同时 它所规定的“圣库制度”

也从物质分配上保证了每个参加起义的人

都能够享受到基本平等的生活待遇

使他们可以全力投入革命

而无物质上的后顾之忧

这对于长期挣扎在赤贫线上

乃至死亡线上的广大农民群众来说

不啻是一个“天堂”

不过 《天朝田亩制度》中所描绘的

“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归根到底还是一个

没有商品交换的绝对平均的社会

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性质

它所追求的仍然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

相结合的传统生活方式

并没有超越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性

1859年春 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

从香港来到天京

洪秀全把他封为干王 总理朝政

洪仁玕根据自己在香港的经验

提出了一个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

全局性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

在“以风风之 以法法之 以刑刑之”

三大原则之下 提出权归于一 严禁朋党

改良风俗 建立法制等一系列措施

政治方面 主张加强中央集权 建立法治

经济方面 主张发展近代工矿 交通 邮政和银行事业

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

思想文化方面 改良风俗 兴办学校

医院和福利事业

外交方面 主张与外国平等自由地交往和通商

这些措施啊与后来洋务派所提出的纲领相比

显然更为全面地反映了近代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

洪仁玕将这一纲领呈报洪秀全之后

洪秀全做了详细的批注

同意了其中的绝大多数主张

并下令镌刻颁布

但实事求是地说 《资政新篇》并非

太平天国的当务之急 换言之

它是一个革命成功后进行经济社会建设的纲领

而不是一个指导革命战争的纲领

在太平天国当时的现实环境下

根本没有条件付诸实践

太平天国是建立在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

相结合的分散的小生产的基础上的

它虽然可以建立暂时的劳动者的政权

但最终会向封建专制政权演变

在太平军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思想开始分化

不少人在生活上追求享乐 互相攀比

在政治上野心膨胀 争权夺利

1856年 早已是“九千岁”的东王杨秀清

假托“天父”下凡 强迫洪秀全承认他为“万岁”

洪秀全表面被迫答应 但心中并不情愿

于是密诏北王韦昌辉

翼王石达开 回京诛杀杨秀清

在这场残酷的内斗中

杨秀清 韦昌辉及其所部万余人先后被杀

石达开自觉得不到洪秀全的充分信任

率部负气出走 最终在大渡河畔全军覆没

天京事变严重的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实力

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一道分水岭

危难之际 洪秀全提拔了陈玉成

李秀成等一批青年将领

并封自己的族弟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

但这已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太平天国的败局

1864年 天京被湘军所围困

洪秀全拒绝了李秀成“让城别走”

另辟根据地的建议 而死守天京

6月洪秀全病故 7月湘军攻破天京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

2

太平天国起义历时14年

转战18省 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

在其影响下 南有天地会起义 北有捻军起义

西南 西北有各族人民起义

天京陷落之后 太平天国余部仍坚持斗争达4年之久

强烈地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

太平天国起义也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体系

清朝的正规军 也就是八旗军和绿营

在太平军面前不堪一击

直到（以）曾国藩等人为代表的主要由在籍官员和地方乡绅

所领导的地方武装 也就是“团练”的兴起

才逐渐改变了这一局面

但从此以后 清朝的军事大权渐转入

曾国藩 李鸿章等汉族官僚所掌握的

由地方团练武装所演变而来的湘军 淮军的手中

督抚分权 人事权 财政权

也逐渐地落入地方封疆大吏的手中

清政府再也难以退回此前

中央大权独揽的强势的局面

太平天国起义还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太平天国起义既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又具有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这集中地体现在《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这两部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上

《天朝田亩制度》比较完整地表达了

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对于拥有土地的渴望

《资政新篇》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

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它反映了太平天国后期的某些领导人

试图通过向外国学习 在中国寻求

国家出路的一种努力

太平天国起义对于日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具有很大的启迪和鼓舞作用

孙中山及其同志非常赞赏太平天国反清的斗争精神

以其后继者自居

中国共产党人也十分注意吸收太平天国的经验和教训

太平天国起义还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

太平天国在与西方列强的交往中

不卑不亢 坚持民族平等 拒绝列强的威胁利诱

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

同时 当列强试图阻止太平军前进

或直接组织“常胜军” “常捷军” “洋枪队”等

帮助清军进攻太平军时

太平军对之进行了坚决的反击

屡败清军的洋兵洋将 却屡屡被太平军所打败

这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志和决心

也粉碎了西方列强迅速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企图

我们把观测的镜头拉得再宽一些

放眼世界 太平天国起义在19世纪中叶的

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当中

是持续时间最久 规模最大 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

对其他国家的民族独立与改革运动也有促进

比如有的学者曾经研究指出

太平天国对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产生了推动作用

太平天国起义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一起

冲击了西方殖民者在亚洲的统治

太平天国之所以最终失败

客观原因是清王朝与外国统治（侵略）者

相互勾结 共同镇压

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

其总体实力远远超过太平天国

这种力量对比的悬殊

是太平天国所以失败的客观因素

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观原因则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

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

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

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

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内部自身的腐败现象的滋长

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

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向心力和战斗力

太平天国运动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

在指导思想上 拜上帝教毕竟不是科学的思想理论

其教义含有大量粗鄙 迷信的内容

这使得太平天国的政权具有很强神权政治的色彩

产生了神权与政权之间的张力

杨秀清早年曾经通过“天父附体”的方式

帮助困顿中的拜上帝教渡过了危机

洪秀全也认可了

但是 当两人矛盾日益加深时

杨秀清再次祭出了天父附体这一招

身为天王万岁的洪秀全在宗教上也只是天父的次子

天父的第二个儿子

所以他必须老老实实地跪在杨秀清的面前

接受他的训斥

这就形成了太平天国天有二日的怪诞局面

天京事变自相残杀之后

拜上帝教的意识形态光环大大退减

洪秀全不仅没有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造

反而强化了其迷信 鄙俗的一面

日益丧失了对于群众的号召力

在文化政策上 太平天国也未能正确地对待儒学

把儒家的经书笼统地斥为“妖书”

捣毁孔教 这种摧毁一切的作法

使其极难获得士大夫精英阶层的支持

相反 使得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成为

太平天国的激烈的反对者

下面我们看一段采自

《凤凰大视野·近人曾国藩》中的视频

太平天国后来对儒学的态度有所变化

主张对四书五经删改后加以利用

不过删去的主要是与拜上帝教不相容的内容

而把儒学中的封建纲常伦理原则都保留了下来

这就涉及到太平天国局限性的又一要害

农民 小生产者 自私 狭隘的一面

导致追求享乐 腐败 内斗 乃至自相残杀

定都天京之后 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们

很快就抛弃了早期的奋斗精神

脱离了广大官兵 建立豪华的府邸

极力追求物质享受

洪秀全有名有号的嫔妃就有88人

杨秀清也有“王娘”54人

1856年天京事变 更是天国中枢

残酷权斗的血淋淋的写照

大大涣散了太平天国的凝聚力

当时在太平天国成员中流传这样一首歌谣

“天父杀天兄 总是一场空

打打包裹回家去 还是做长工”

天京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在对外政策上 太平天国对外国侵略者虽有反抗

但是缺乏理性的深刻的认识

他们一方面有幻想

对外国侵略者和外国人民不加区隔

把信奉天父上帝的外国人都笼统地称为“洋兄弟”

另一方面又抱持“天朝上国”的心态

把外国使节视为来自低贱属邦的代表

最终 不仅无法利用清廷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

还促使二者联合在一起

在军事战略战术 民生经济政策上

太平天国也有诸多失误

总之 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

虽然农民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中国具有巨大的革命潜力

但其自身不能负担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

取得胜利的重任 单纯的农民战争不能完成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3

19世纪60年代初

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

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

陆续采取一系列学习西方武器装备

和科学技术 兴办洋务的措施

以应对当时的危局

这些措施有的是根据

与欧美列强所签订的条约

所不能不完成的“义务”

有的是中央主持对外交涉的官员

比如奕訢 文祥

和在地方主持军事的地方封疆大吏

比如曾国藩 李鸿章 左宗棠 张之洞

在经过了切身的痛苦体验之后

而主动提出的补救措施

这场运动涉及内政 外交 军事 经济

教育等诸多层面

前后延续达30余年

时人称为“同治中兴” “同光新政”

后世的史学家则常称之为“自强运动”

或“洋务运动”

这些主张“洋务”的官员

一般也被成为“洋务派”

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

首先是为了购买和制造洋枪洋炮

以镇压农民起义

同时也有借此加强海防 边防

并乘机发展本集团的政治 经济

军事实力的意图

这一点 在奕訢等人的奏折中说得很明白

奕訢认为 太平天国 捻军等农民起义是

“心腹之害” 俄国是“肘腋之忧”

英国则是“肢体之患” 所以

“灭发 灭捻就是灭太平天国 灭捻军为先

治俄次之 治英又次之”

具体怎么办 奕訢提出

“探源之策 在于自强

自强之术 必先练兵”

李鸿章的主张与奕訢基本一致

他认为 “但求外敦和好 内要自强”

而“中国欲自强 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欲学习外国利器 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对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

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

他在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

思想的启发下 写成了《校邠庐抗议》一书

冯桂芬以西方为参照系

进一步放眼世界

寻找中西差距

提出了惊世骇俗的

“法苟不善 虽古先吾斥之

法苟善 虽蛮貊吾师之”的观点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

开眼看世界者林则徐的门生

冯桂芬不仅大胆承认中国“不如人”

而且努力找出“不如人之所在”

强调“采西学” “制洋器”

兴利除弊 革新政治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

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这一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所谓“中体西用”

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

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

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作为辅助

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换句话说 就是要用西方近代的工艺

科技来维持清朝的统治地位

把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

纳入中国封建主义的轨道之内

我们一般把1861年清廷开设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也就是总理衙门

视为洋务运动的起点

把1895年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惨败

特别是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视为

洋务运动的终点 在这三十多年间

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 归纳起来

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 兴办近代企业

洋务派首先兴办的是军用工业

1890年以前

在全国各地共创办了20多个军工局厂

其中规模较大的是5个

1865年 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等筹办的

上海江南制造总局

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

同年 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

1866年 左宗棠在福建创办了福州船政局

还附有船政学堂 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

1867年 崇厚在天津建立了天津机器局

1890年 张之洞在汉阳创办了湖北枪炮厂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中遇到资金奇缺

原料和燃料供应不足

以及交通运输落后等困难

需要加以解决

因此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

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

洋务派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

重点是采矿 冶炼 纺织等工矿业和航运

铁路 电讯等事业

这些企业除少数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的方式之外

大多数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

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

开平矿务局 天津电报局 上海机器织布局

都是李鸿章筹办或控制的

这些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

虽然受官僚的控制 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二 建立新式陆海军

训练新式海陆军是

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

也是兴办军事工业的目的所在

1861年1月 奕訢 文祥等人

奏请训练八旗兵丁使用洋枪洋炮

次年 首先在天津成立洋枪队

聘用外国教练 选派京兵赴津训练

接着 上海 广州 福州等地

也按照天津练兵章程分别成立了洋枪队

后来陆续推广到沿海和沿江的各省

在当时训练的新式陆军中

以湘军和淮军的力量最强

海防建设是军事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1874年 日本侵略台湾

中国被迫赔款妥协 朝野震动

总理衙门大臣沈葆桢等人以此为契机上奏

率先指出日本拥有铁甲舰队

对中国海防所构成巨大的威胁

第一次“海防之议”由此兴起

1875年5月

清政府任命沈葆桢和李鸿章分别督办

南 北洋海防事宜 鉴于中法战争的教训

1885年 清政府展开了第二次海防之议

定下了“以大治水师为主”

和“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的调子

李鸿章乘机扩充由他控制的北洋海军

1888年 北洋舰队正式建立

拥有军舰22艘

聘英国人琅威理等为海军教习

掌握操演大权

同时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

确定了人员编制 并规定每3年会操一次

由此北洋海军成为中国乃至当时

整个亚洲实力最强的舰队

但自此以后 由于朝廷内部的权力倾轧

户部上奏禁止北洋海军外购军火

北洋海军再无实质性地扩充与发展

而海军衙门的经费则被源源不断

挪用去为“太后归政”而兴的重修

颐和园工程和“三海”工程 也就是

南海 中海 北海三海工程

累计达一千余万两白银

主要为抵御日本侵略而创建的北洋海军

终于在甲午战争的炮声中灰飞烟灭

从而宣告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三 创办新式学堂 派遣留学生

兴办近代工业 训练新军

要有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

为此 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

从19世纪60年代

到90年代这30多年间

创办新式学堂30多所

主要有三种 一为翻译学堂

比如京师同文馆 主要培养翻译人才

一为工艺学堂 培养电报 铁路

矿务 西医等专业人才

—为军事学堂 如船政学堂等

培养新式海军人才

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

还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及

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4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人

即洋务派 希望通过学习西方

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一次努力

也是近代中国人探索国家出路的一次尝试

他们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 集中力量

优先发展军事工业

同时也发展了若干民用企业

在客观上对中国早期的工业发展和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但是洋务派兴办洋务新政

“自强”也好 “求富”也罢

主要还是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

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洋务运动时期

为了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

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

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

与此同时京师同文馆

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馆

还翻译了一批西学书籍

虽然其中大部分是有关

近代物理 化学 数学 天文地理的

自然科学书籍 内容浅近

但毕竟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

使人们打开了眼界

洋务运动时期 伴随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

传统的“重本抑末”“重义轻利”

商为“四民”之末的观念

都受到冲击 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

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

西方的各种技术和器物不再被

当作“奇技淫巧”受到排斥

而是被视为模仿 学习的对象

这一切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

然而由于洋务派囿于

封建地主阶级属性的藩篱

最终走向自我窒息之途

决定了洋务运动必然要走向失败的命运

首先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即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

在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代企业

也就是说洋务派企图以吸收

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

来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

它并非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

而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

由于未能在清帝国的正式体制里

明确地位 洋务运动只能是在

体制边缘的隔离区进行零散的试验

而这些新的生产力因素

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

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外壳中

充分地发展起来的

他们既要发展近代企业

却又采取垄断经营 侵吞商股等手段

压制民族资本 既想培养洋务人才

又不愿改变封建科举制度

其次 洋务运动对西方列强具有依赖性

洋务运动进行之时

清政府已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批

不平等条约

西方列强正是依据种种特权

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加紧

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

它们并不希望中国真正的富强起来

而洋务派官员却一再主张对外“和戎”

不敢 不能坚决地维护国家主权

一味的迷信所谓“国际公法”

希望用妥协换取清朝统治的苟安

其所兴办的企业 学堂 海陆军

在设备 技术 管理 训练等方方面面

都要仰赖外国人

洋务派企图依赖外国来达到

“自强”“求富”的目的

无异与虎谋皮

再次 洋务企业具有腐朽性

洋务派所创办的新式企业

虽然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

但其管理却仍然是封建衙门式的

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由官方控制

经营不讲效益 造出的枪炮轮船质量低下

许多官员既不懂生产技术

又不懂经营管理

无法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行

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 其管理也是由政府

“专派大员” “用人理财悉听调度”

商人们并没有真正的发言权

往往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损

企业内部极其腐败 充斥着徇私舞弊

贪污 盗窃 挥霍 浪费等官场的恶习

在这样的风气之下“求强求富”

就成了一句空话

5

从19世纪70年代至1898年这30多年间

由于洋务运动的推动及其后续影响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开始陆续出现

这些企业主要是由一些官僚 地主 买办

和商人投资而来

同时在通商口岸也出现了一些新式的

商业和手工业或者原有的手工业企业

采用了新的技术和管理方式

这样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新兴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

他们既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打击

又受到中国的封建主义的压制和摧残

新兴的民族工商业举步维艰

民族资产阶级迫切希望中国独立富强

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顺利发展

提供条件 而洋务派 洋务运动

由于其自身的阶级局限

没能提供这样的条件

而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

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

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

一大批中国的志士仁人把挽救国家危亡

摆脱民族苦难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他们接二连三地发出了必须迅速学习西方

仿行西法的急切呼声

断言西方一切政皆出于学

唯有西方才是“致治之本 富强之由”

也就是说不但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而且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

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

人们逐步达成要救国只有维新

要维新只有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识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迅速传播

逐步形成变法维新的思潮

进而发展成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站在救亡图存 变法维新思潮前列的

是康有为 梁启超 谭嗣同 严复等

代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知识分子

他们采取了以下手段宣传维新思想和主张

一 向皇帝上书

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早在

1888年就第一次上书光绪帝

提出变成法 通下情 慎左右等三项建议

此后又多次向光绪帝上书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

1895年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

所共同发起的“公车上书”

二 著书立说

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梁启超的《变法通义》谭嗣同的《仁学》

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等

这些著作无不表达他们为国为民

谋求生路的理想和愿望

三 介绍外国变法的经验教训

如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了《日本变政考》

《俄彼得变政记》 《波兰分灭记》等书

四 办学会

1895-98短短三年之间

全国各地创立各种以学习研讨西学

及变法维新为主的学会达30多个

其中著名的有

1895年11月成立于上海的强学会

1898年2月成立于长沙的南学会

1898年4月成立于北京的保国会

五 设学堂

康有为1890年后就在广州设万木草堂

聚徒讲学 培养变法骨干

维新派创立的另外一个著名学堂

是依托于长沙岳麓书院的时务学堂

六办报纸

维新派出版的致力于传播西学

和维新思想的报纸近20家

影响最大的有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

严复主办的天津《国闻报》

和湖南的《湘报》等

其中《时务报》在全国各地的

发行点达到100多处

总之 维新派以各种方式宣传变法主张

制造维新舆论 培养变法骨干

组织革新力量 他们的重点是争取光绪帝

及其周边的帝党官员的支持

希望通过他们自上而下地推行变法主张

对于维新派在中国思想界掀起的波澜

当权者实际上存有着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甲午战争的惨败让他们认识到

只有通过维新改革

才能挽救危机四伏的朝廷

另一方面 在变法是由谁来变

怎样变以及怎么变的问题上

双方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争论

封建守旧派及反对改变

封建政治制度的洋务派

甚至斥责维新思想是“异端邪说”

指责康梁是“名教罪人” “士林败类”

守旧派和维新派之间 围绕着要不要变法

要不要设立议院 实行君主立宪制

要不要废除八股文 改革科举制

等重要问题展开论战

这场论战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

和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通过论战 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

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戊戌变法运动的序幕随之拉开

1897年冬 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

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激发下

维新派加紧活动

1898年初康有为上书光绪帝

指出形势迫在眉睫 如果再不变法

不但国亡民危 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

都要做不成了

1898年6月10日光绪帝令翁同龢

起草《明定国是诏》送呈慈禧审阅

得到批准 并于次日正式颁布宣示变革决心

百日维新由此开始

在百日维新期间 维新派通过光绪帝

颁布了数百道变法诏令

涉及人事 文化教育 政治 经济 社会

等方方面面 主要内容如下

这些改革诏令的颁布

旨在开放一定程度的言论 出版 结社自由

使资产阶级享受一定的政治权利

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传播西方科学文化

但是在光绪帝发布的这些新政诏令中

并未包括维新派多次提出的开国会等政治主张

因此这些政令和措施并未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

是一种十分温和的而且不彻底的改革方案

但是即便如此

新政诏令还是触动了守旧派的利益

和守旧知识分子的传统信条

受到了中央各级守旧官僚的抵制

在地方巡抚中 除了热心变法的

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执行变法政策外

其余地方督抚多处于观望状态

并未大力推行

聚集在慈禧太后身边的守旧势力

经过密谋策划

于1898年9月21日发动政变

慈禧太后以训政之名 重新垂帘听政

并囚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

同时下令搜捕维新人士

康有为 梁启超被迫逃亡国外

谭嗣同则拒绝了梁启超

要他一起逃亡的建议

下面我们来看一段采自

凤凰大视野 回望梁启超

当中的纪录片 视频

仅仅推行了103天的维新变法

就这样在守旧势力的绞杀下

悲剧性地失败了 史称“百日维新”

各项维新举措除京师大学堂

也就是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

被保留了下来之外 其余大都被废除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

发动的这场扼杀维新变法的政变

史称“戊戌政变”

6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昙花一现

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仍然有着

重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 戊戌维新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

维新派在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

要求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实现国家富强

维新派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

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其次 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

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

它突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

主张以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

虽然并未成功 其间颁布的

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措施

也未能生效 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

冲击了封建制度

第三 戊戌维新是一场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

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

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

批判封建君权和纲常伦理

大力宣扬自由平等社会进化的观念

有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

在维新派的推动下 “诗界革命”

“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

“戏剧改良”“史学革命”等相继而起

形成了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

以维新运动为起点 资产阶级新文化

开始打破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

在教育方面 维新派主张采用

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兴办新式学堂

这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

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更成为

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

维新派不仅在思想启蒙和

文化教育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

而且在改革社会风气方面

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

如主张革除吸食鸦片及

妇女缠足等恶俗陋习

提出“剪辫易服”的主张

倡导讲文明重卫生等 其移风易俗

开启社会新风的效用不可低估

最后 戊戌维新对日后的资产阶级

革命运动也产生了促进作用

尽管康梁等人后来成为坚持改良

成为革命的阻力 但是他们在戊戌维新

传播西方进步思想的努力

已经点燃了爱国民主的思想的启蒙火种

促进了大批知识分子觉醒

其中不少人后来都走上了

反清革命的道路

维新派的思想启蒙努力功不可没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

客观上是由于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

经济力量还十分微弱

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

还相当狭窄 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

守旧势力还很强大

而且拼命地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新旧力量实力对比太过悬殊

戊戌维新的失败 主观上

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

这突出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不敢否定封建主义

他们在政治上不否定封建君权

只是幻想依赖光绪帝

实现自上而下的改良

逐步的实现君主立宪

在经济上虽然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但是根本不敢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

在思想文化上 尽管提倡学习西学

但仍然要打孔子的旗号“托古改制”

第二 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维新派虽然大声疾呼救亡图存

却又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

变法维新 幻想依靠与英日结盟

来抵抗俄国 而英日帝国主义

虽然表面上同情维新派

却只想趁机扩大其在华势力

并寻找它们在中国的代理人

戊戌政变之前维新派曾分别向

英 美 日等国公使求助 但都落了空

三 惧怕人民群众

维新派的多数人本身就兼有

地主 官僚 士绅的身份

与人民群众有着天然的隔膜

而他们的活动也主要局限于

官僚 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

他们不但脱离人民群众 甚至惧怕

乃至敌视人民群众

不能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

缺乏人民群众的支持

是戊戌维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戊戌维新的失败与维新派缺乏

政治策略与智慧也有一定关系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维新派在推动变法时

有意挑起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对立

执意从最为艰难的政治体制变革下手

进退太骤太猛

使改革与反改革处于尖锐的对抗态势

维新派的领导人康有为

虽然饱读诗书 但是在政治上却是一位

缺乏经验的“素人”

据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所记载

时任直隶总督荣禄曾问康有为

“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回答“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

荣禄又问“固知法当变也

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

康有为说“杀几个一品大员 法既变矣”

作为维新变法的领袖 总操盘手

康有为如此不知分寸 狂妄躁进 缺乏智慧

又焉能不败呢

英国人班德瑞曾这样评价道

“康有为是一位富于幻想

而无甚魄力的人 很不适宜

作一个动乱时代的领导者

很显然他被爱好西法的热心

所驱使 同时又被李提摩太的

一些无稽之谈所迷惑”

康有为自己的族弟康广仁也曾抱怨

“伯兄规模太广 志气太锐 包揽太多

同志太孤 举行太大 当此排者

忌者 挤者 谤者 盈衢塞巷

而上无权 安能有成 弟私窃深忧之”

戊戌维新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实践

竟失败得如此之快

这不但暴露了维新派自身的

局限性和软弱性

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旧中国 希望通过统治者

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必须用革命的手段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

才能实现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

戊戌维新的流血失败也使一部分

有识之士看清了清政府的顽固性和腐朽性

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们在下一章就将学习孙中山先生

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

7

翁老师 在这一章中我们学习了

太平天国运动 洋务运动 戊戌维新运动

这些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

非常波澜壮阔的大事件

内容也非常丰富

那我们有些学生可能会一时把握不了（那个）主要线索

这章的主要线索就是这一章的章名啊

就是“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像我们在第一周的课最后所讲的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历史任务

也就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背后

都有一个共同的最高的目标

就是建设中华民族自己的民族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这章所讲的三个大事件

应该说是都是属于对

这个目标的早期的探索

这里我想特别提一提洋务运动

有的学者可能不太同意

他们会说洋务运动主要是为了挽救大清王朝

洋务派搞军工 建新式陆海军

主要是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这种说法当然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洋务派这么做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抵御外侮

挽救民族危亡

镇压人民的反抗也不一定要

购买7000多吨的铁甲巨舰 对吧

也不一定要建设远东最大的舰队 对吧

所以这里当然有保卫国家海防的考量

所以说洋务运动固然是

一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但是也是近代中国人民探索

国家出路的一次早期尝试

翁老师 在我以前的记忆中间

太平天国运动无疑是一场

非常进步的革命运动

但是在近几年学界的研究中间

很多人说太平天国就是

杀人无数 破坏生产

是从整体上对太平天国进行否定

他们甚至引用马克思的一些话

来批评太平天国运动

噢 我知道马克思在1862年发表的

《中国纪事》中有一段话

是啊 老实说 我读到这段话时也挺震惊的

他说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

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

他们没有任何口号

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

惊惶还要厉害

他们的全部使命

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

来与停滞腐朽对立

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太平军是中国人幻想

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

嗯 但是我们应该辩证地全面地

看马克思这段话

马克思也不是所有论断都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

他所依据的主要材料

来自英国驻宁波的领事夏福礼

写给英国驻北京的公使的信 现在看来啊

马克思当时可能没有掌握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更为全面的深入的信息

太平天国运动确实存在自身的很多问题

最主要的就是农民阶级无法克服

自己身上固有的小生产者的局限性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杀人比较多

中国人口锐减是事实

但是我们要看到

其中也有很多屠杀破坏行为

是由于清军 湘军 淮军的镇压而造成的

太平天国确实对中国江南的文教事业

产生了很大破坏

破坏孔庙 捣毁书院 烧了很多书

你知道四库全书的抄本一共就六套

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就有三套

或者说是两套半

杭州文澜阁那套被藏书家丁氏兄弟

又救回来了一些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太平天国对儒家的这些冲击和破坏

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

削弱封建统治精神支柱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看

无论在中国古代还是在近代

作为被剥削阶级的农民

他起来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

要求获得土地 其中的合理性

其中的正义性是不容否认的

我认为这是更重要的一方面

嗯 您这么一说我就更清楚了

很有意思的是 与太平天国运动正好相反

这些年对洋务运动的评价越来越高

曾国藩 李鸿章这些洋务派

原来的形象都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侩子手

教材都不给配正脸像的

我记得那时候课本给曾国藩配的图

是他湘军水师被石达开大败

他羞愤投江的难堪场面

现在曾国藩 李鸿章

这些洋务派的形象似乎越来越正面

以他们为主人公的小说 影视作品也很多

我们学生中

也不乏欣赏甚至崇拜他们的人

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嗯 我觉得这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我们史学研究的进步

不再是简单地把一个人物脸谱化

非忠即奸

其实洋务派人物啊也不可一概而论

本身也是比较复杂的 像李鸿章

他对外比较软 妥协得比较多

亲俄 迷信以夷制夷

他总是幻想着依靠俄国来制衡日本

但是像左宗棠 他对外就是比较硬的

你知道左宗棠

攻灭了阿古柏政权 收复新疆

力拒俄国入侵 在维护国家主权

抗击外来侵略上是有很大贡献的

即便是李鸿章 虽然在外交上很失败

但是在推动中国近代企业发展 交通发展上

也确实是起过正面作用的

是啊 现在甚至有人评价李鸿章是

“中国近代化之父” “中国现代化第一人”呢

这个 我个人觉得还是高了

李鸿章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

他充其量是个“能臣”

或者用李鸿章非常富有自知之明的一个“自况”

他只是一个“乱世”“破屋”中的“糊裱匠”

只能勉力地修修补补而已

你看他殚精竭虑 多年经营

建设出那么强大的一支远东的第一舰队

北洋水师

以他为首的淮系集团创立了轮船招商局

开平矿务局 上海电报总局

这么多近代民用企业

但是他作为洋务运动最大的操盘手

对大清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框架

连碰都不敢碰 还是维持着君主专制

君君臣臣那一套

所以我说洋务运动对于西方

军事 技术 外交 工业的学习和模仿

是一种浮于外表的一种近代化的尝试

而对于现代性文明的核心

政治制度 社会理论 哲学思想

几乎都没有触及

这一点和稍后的戊戌维新变法比

和同时期的日本的明治维新比

显得尤为明显 所以我们就不可能指望

洋务运动能够取得现代化的实质性的突破

所以您认为李鸿章自身的高度不够

或者说洋务派自身的局限

导致洋务运动最终的失败

可以这么说 但是更全面更辩证地看

应该说是整个中国社会自身的限制

局限所导致的

假设李鸿章的高度真的够了 见识够了

真的想在中国推进全套的近现代文明

慈禧太后乃至整个大清王朝还能容得下他么

还能让他继续在中堂那么重要的位置上坐着么

早把他扒拉下去了

就他搞的那点零敲碎打的近代化努力

在当时都遭到极大的非议

当时绝大多数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对于

洋务是非常不屑的

认为是有损尊严的“卑”“野”之事

李鸿章想修条铁路把开平煤矿的煤拉出来

费了好大功夫 对慈禧太后连哄带骗地

才修成了不到十公里的中国第一条铁路

你知道就是唐胥铁路

但是守旧派的官员怎么说啊

震动龙脉啊 惊动皇陵啊

我大清朝多少先皇先后在附近地下躺着呢

你这火车一跑 轰隆轰隆的

老祖宗在地下怎能睡得安生呢 最后朝廷下旨

不让蒸汽机车开了 改用骡马去拉

“马车铁路” 世所罕见 何其荒唐

铁路在当时的欧洲已经是

多么普遍的一件事情

所以 权势喧天的李鸿章才会非常无奈地感慨

“官绅禁用洋人机器 终不得放手为之

文人学士动以崇尚异端 光怪陆离而见责

中国人心真有万不解者矣 ”

是啊 这些守旧势力的掣肘也是

洋务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吧

是的 不过守旧势力掣肘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

是整个中国社会心理的一种积习

传统的包袱实在是太沉重了

活在天朝上国 中央之国的大梦里

已经太久太久了

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 不愿意变

哪怕一些枝节的技术层面的变革

有时都很难被容忍

我觉得这也是在中国改良运动

维新运动总是不容易成功

最后不得不诉诸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讲到维新 好像这几年学术界

关于戊戌维新的研究非常多 材料也很丰富

对 像我们清华的蔡乐苏 张勇 王宪明几位老师

早年参与编辑的《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目》

以及他们在此基础上所写成的

《戊戌变法史述论稿》

更新一些的像茅海建先生的《戊戌变法史事考》

一共两集 皇皇百万言

还有他去年刚刚出版的

《戊戌变法的另面 “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这些基于新史料的细致的考证研究啊

都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戊戌变法的认识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来看一看

那您认为这些研究给我们

最大的启示和结论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大的结论就是

很多问题还没有结论

像茅先生 他爬梳了那么多史料

总结了那么多前人的研究

但他也仍然没有定论

他承认“戊戌政变”的时间 原委和经过

“至今仍然迷雾重重 聚讼纷纭”

但是他们的研究啊有一点很重要的启发

我愿意和同学们分享 就是今天看来啊

康梁师徒当年出于种种考虑

曾经对有关的史料进行过加工和处理

有些地方甚至是很大的原则性的改动

甚至一些已经被我们广为引用的资料啊

里面也杂有很多不实的成分

我们切不可依据康有为日后

所写的文章 所编的文集

去论断康有为戊戌时期的思想主张

反对维新的顽固派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

总之 我们需要更为小心仔细地甄别 比对

多重证据 交叉互证 才能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

嗯 谢谢老师的讲解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吧

再见